

致 谢

我特别应该感谢三个人，他们为本书做出了各不相同的贡献。在多年的争论和辩论中，查尔默斯·约翰逊教授始终不渝地给我以支持，使这样一项研究得以坚持下来。谢伟思一直提供着无价的信息和信心。最初把这位初入学术圈的中国问题专家吸引到这一领域的是有关美国在亚洲所起作用的一些问题，命运的幸运安排使他先在伯克利成为校友，继而成为本书的编辑。不过，若不是已故安德森·程济时（音译）对本书抱有兴趣，它可能永远也不会变成现实。他在本研究最初亦即最艰难的阶段所给予的指教是须臾不可或缺的，故全部手稿杀青之际不能再从他的批评中获得教益，令我深感遗憾。

我要感谢陈志让、C. Y. 宋、马风华（音译）、西尔维亚·钱、戈登·贝奈特、马克·布莱切尔和鲍博·马克斯。他们对不同章节作了批评性评论。如果说有时我以与他们的意思相去甚远的方式把他们的想法付诸写作的话，责任不在他们。本书还应归功于沃伦·伊尔切曼教授开设的发展行政学研讨课，其思想启迪实非其表面所及。

给予过我帮助的人很多，远非我在此所能列举。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无法胜任搜集和翻译资料的工作。在伯克利的中国研究中心，C. P. 陈和纪文顺当仁不让，有求必应，而我的请求仿佛无穷无尽。在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罗逸飞、郝万仪以及全体职员

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一如杰拉尔德·伯克利、莱斯利·钱、约翰·道尔芬、劳伦·弗斯勒、盖伊·瑟尔斯、珍妮特·斯威斯洛和拉瑞·魏斯所做的那样。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会图书馆缩微胶卷和报刊阅览室、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东亚部以及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和亚洲研究中心，图书管理员和工作人员无不对我的研究工作伸出援助之手。许多让我分享其回忆录的友人与相识同样如此。

加利福尼亚大学及其中国研究中心慷慨解囊，为本研究课题提供了多年资助。我还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同仁的帮助。《中国季刊》（第 48 期）和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查尔默斯·约翰逊编《现代中国思想与政治》已节选刊载了第三、五、六章，我在此感谢其慨允将此件重新发表。

第一部

国民党统治末期

第一章 引言

在外部世界看来,1945—1949年标志着亚洲最大的国家从一个国际力量阵营转向了另一个国际力量阵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在美国掀起了一股政治舌战浪潮并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激起了一个防止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新决心,且直接导致了美国卷入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

在反思这些事件时,西方学者首先把焦点放到了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冲突的军事进程上,其次放在美国旨在影响和遏制这一进程的种种努力上。面对西方读者,史学家们每每诉诸读者兴趣与关切之所在。1949年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的著作出得最多,国民党的溃败被径直解释为一场政治失败,并将共产主义的胜利视为非法篡夺政权。“中国的陷落”也看作是美国的一次失利,人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最关注的一点是应当确定还是推卸责任。学术研究、正式出版物以及党派政治辩论无不受到这一关注的激发。对说英语的读者而言,1945—1949年这一阶段^[1]的中国内战史基本上成了一部战事输赢的记录、提供和拒绝美援的记录以及对援助品分配者动机调察的记录。

不论这是否全然出自政治利益和思想偏见——为麦卡锡时代的

可怕影响年加剧——我们无须拘泥于此。美国新闻记者及其他人所著多部亲历实录确实采取了一种较为开阔的眼光 而本书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延续^[2] 即尝试拓展1945—1949 年的历史记录 使之包含政治内容 而它使军事斗争对直接相关而言产生了意义。

本书在许多方面还是初步的和不尽全面的，原始资料并不十分丰富，充其量只是介绍了各种多尚未被探究过的问题和疑点。文献空白也颇多 有的可能永远无法填补。本书也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它并非展示一部关于政治人物、事件、思想或组织的连贯记录，而是仅限于两大政权争夺者的政策与实践的层面。具体而言它比较、分析了两大对手及其与渴望加以统治的社会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内战乃是一场争夺国家政权的军事斗争。战争既是通过另一种手段进行的政治，因而政治角斗场上必有种种线索，表明这场冲突的性质和结果。这场斗争的政治内涵非但规定了争夺者的身份 而且规定了其作战的目的、信念的性质以及可供其支配的资源。从这一研究目的出发 政治被界定为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作用和交换的过程。更确切地说 它是这样一种交换，一方是社会权位的占据者 另一方是该权力施行于其身的全体人民中的个人、群体及阶层。政治资源提供了交换手段 并且在这些社会成份和政权之间被交易，以达到各自的目的。

虽然由全体人民划分成的不同集团能够保持一种脱离政权的存在形式 但反之却不然。政权要靠它们的维持 不能离开它们而孤立存在。不同政权在其与不同集团的交换关系上性质有别。这一界定的假设却是 参加政治角逐的个人和党派 不投入这一交易便既不能夺取权力 也无法保持权力。当订立同盟、确定政策和贯彻计划时，交易就发生了。

在争夺者对权力的企望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从现政权夺取

资源。假如后者有弱点可以利用 则做到这一点明显是轻而易举之事。现政权与各阶层的关系愈是松散 则争夺者愈有机会消除他们的抵触 并最终赢得他们的支持。这一关系还可以若干方式得到加强 如执行的政策 作出的许诺 参与的人物 等等。“拥护”如同“反对”一样 具有多种形式 既有形 亦无形。政治资源量多类繁，其中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相互斗争中藉以维持其军队的小米和人力。中国民众与这两个对立的政党进行此种及其他资源交换的种种情况，便构成了我们探究的课题。

政治之被界定为相互作用和交换过程这样一个概念，已在社会科学家中得到了一定的认可，^[3]但未必在其他领域流行。因此 确认这一概念 对于以处于革命性变化中的陌生的政治体系为主题的研究而言 可能颇有用处。在我们较为谙熟的文化环境中 例如在我们自己的文化环境中 无需向任何人提示这些基本政治原理。美国新闻记者或政治分析家绝不会在试图估价一次总统选举结果之时 不先考虑可能影响南方、农业地位、黑人、劳工、白领工人等票数的种种问题。全民中的这些群体和华府当局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换关系 十分明显 无需赘言。

然而 碰到与我们不同的政治形式和风格时 就不必采用这些同样的假设了。当政治对抗者之一是积极用暴力推翻现政权的共产党时 这一点尤为正确。确实 尝试对任何一个社会的这样一段历史插曲进行政治分析，都无异于将自己置身于风口浪尖之上。视政治正统为既定的组织和程序模式及公认的政治行为规范的衍生物 并非特别奏效 而那些模式和规范不但受到质疑，而且受到挑战 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更重要的问题无疑是这一挑战本身的性质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条件。这种条件必定植根于过去。但在今日 它们必定也衍生于个人在组织和程序形式上对它们的应用 而这些人既占有这些条件 又在这些条件下活动。

把这一挑战当成主要产生于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和控制方式也是不全面的 这是贯穿于西方对共产党领导下革命运动所作评判中的另一常见主题。这一假定产生的分析上的困难，最明显的例子，可见于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进行的一项权威性研究^[4] 此书开篇即描述吴庭艳政权如何在 1954—1963 年期间给南越社会各阶层带来的巨大苦难 直至“吴氏政权的衰败”以其本人被推翻而告结束。作者以年代为序 逐一列举各阶层的逐渐疏远 结语说道：“人们感到正在亲眼目睹整个社会结构分崩离析。”^[5]然而，该书其余部分基本忽略了论及吴氏所处环境那一章的内涵，仅限于描述那一时期诞生的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和方法。作者提出 只有遭受过真正苦难的人 才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组织 并接着写道：“确切地说 民族解放阵线情况恰恰相反。它一举诞生 勃然兴起 既而发展壮大。苦难则几乎被演化或加工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添加物了。”^[6]

这些允许各种矛盾溜出人们视线的假设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畴。这些相同的假定既已引起人们全力关注美国未能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进而要求对美国在越南的冒险作出合理的说明，也无疑会激发人们去尝试解释美国在那里的失败。不过，军事干预的政治局限性现已完全明晰。激励人们探究全部政治组织与政治问题之间关系以及政权争夺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因素也显而易见。

在详述马基雅维里就夺权与保权技巧给有抱负的统治者所提出的建议时，一位学者写道：

首先 新君主须更有把握为国家带来安全 此乃其本人新近登基之事实昭示此重大必要性。他须采取较其所替代之政府更为有力和有效之措施，以期从此以后予人民以更大安全感。然而，此等进展几无不因以往之权威欠缺而出现……效忠之迁在

此情形之下盖可随时发生。旧日忠君之统遂化为乌有……人民乃指望新政府赐予安全、和平及法制之更佳期许。〔7〕

本研究力求断定当政的国民党在其掌权末年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真正存在一种“权威欠缺”。与此相反第二个目标是弄清中共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赢得了效忠，而效忠总与公众对占据政治权位者的认可结伴而至。中国共产党真正赢得了合法统治权吗？抑或说他们在本质上是国民党所铸大错和日本人所犯暴行的受益者吗？

注 释

〔1〕 中国史学家把 1945—1949 年这一时期称作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分别为 1924—1927 年和 1927—1937 年。

〔2〕 最著名的有鲍大可著《共产党人接管前夕的中国》杰克·贝尔登著《中国震撼世界》德克·博德著《北平日记：1948—1949 革命的一年》韩丁著《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以及 F. 梅尔比著《受命于天 中国内战录，1945—1949》。有关出版物详情，见参考书目选要。

〔3〕 事例见沃伦·F. 伊尔切曼和诺曼·厄普豪夫著《变化的政治经济》及其所引之资料。

〔4〕 道格拉斯·派克著《越共：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和方法》（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6 年）。

〔5〕 同上 第 73 页。

〔6〕 同上 第 76 页。

〔7〕 查尔斯·W. 亨德尔：《权威本质之探究》见卡尔·J. 弗里德里克编《权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 年）第 10—11 页。

第二章 结局的起点 接受日本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在华冒险以不同方式影响了两大争权者的政治命运。最初，日本的进攻触发了一场民族主义反应，使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了一起，共同开展统一的抗日运动。这一运动把这位委员长置于领袖地位，因为只有他在全中国独具足够高的地位，来领导全民抗战。^[1]蒋氏及其领导下的政府遂被朋友和敌人共同视为全中国决意抵抗侵略的象征。

为了维护这个名存实亡的象征，蒋氏及其国民政府在不断推进的日军前面，被迫从华北和沿海地区撤往西南。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伪政府，接管了退却的国民党空出的权位。与此同时，来自延安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则得以利用日本人对华北的进犯。共产党人之所以特别具备如此行事的条件，是因为 1927 年他们在城市的据点遭毁后，一直被迫开展着游击战和农民革命。凭此经验，他们立即开始在敌军进攻线后方的农村组织抵抗运动。结果，他们成为中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来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到了 1945 年 4 月，中共宣称已掌握了约有 9550 万人口的地区。

相比之下，在利用日本入侵给它带来的同样机会方面，国民党政府却无所作为。该政府可能赢得了全国和国际上对其作为

自由中国代表的承认 但就国内政治力量或民众拥护而言 截止 1945 年，它所获无几。政府的确也在日占区发动了游击战和秘密战 但从未扩展成一场广泛的抵抗运动。偏安重庆的岁月未有建树，而其政治制度的内在弱点却相应地加剧了。1944 年年中，一位美国外交机构的官员写道“，国民党比前十年的任何时期都虚弱 委员长正在失去全中国的拥护。依靠团结一致 共御外侮，中国在对日战争头两年里找到了一种新生力量。如今内在弱点却日益加剧 统一的进程在发生逆转。”[2] 普遍不满、政治对立 弊政以及军政机关的空前腐败，成了国民党败落的确切标志。

然而，1945 年 8 月，日本的战败为国民党提供了最后一次机会 也可以说舆论如此认为。突然间 政府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重树权威的地位 这一权威覆盖的地域 加上自由中国各省 容纳了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大公报》称之为千载难逢之良机 吁请政府利用日本投降更新其政治统治权 并重振民众的政治士气。该报告诫道：“吾辈万万不可枉费光复地区民众之信心。”[3]

30 年后的今天，每逢那一代中国人回忆内战岁月或当其子女重温父母对彼时的记忆时，他们几乎一致把焦点放到 1945 年秋冬接收日占区之举上，视之为民众对国民党统治普遍绝望的开端。中文“接收”一语是中性的 其涵义丝毫不超过接受或收到。但随着民众不断经受国民党的接收 表示洗劫和明夺暗抢的同音异义词 汉字各不相同 就替代“接收”而流行起来。[4]

信心普遍低落在城市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人们最深切地感受到了恢复时期的种种影响。奉派接收敌伪政治和行政单位及敌有资产的政府官员蜂拥而至，驾临各城市。正是在这些城市，这班贪官遇上了最有油水的机会，而他们贯彻的复兴方针，给经济生产带来的只能是浩劫。正是在这些城市 公众对这些情

况最为了解 不仅因为这里有臭名昭著和肆无忌惮的行径 而且由于这里是不全受控的舆论界的大本营。

这几个月的决定性进展 使政府的公开形象发生了变化。政府本身并未因重返沿海而改变。认识到国民党缺陷的人预见并告诫说，它重返沦陷区时可能会出问题。^[5]但那些缺陷的严重程度 直到接踵而至的战后时期才家喻户晓。公众的幻灭感加重了，原因是腐败无能竟出自八年来一直充当民族振兴意志象征的政府。人们猛然发现 国民党的战时声誉不能衡量它在战后的表现。

假如政府在随后数月采取行动 纠正恢复时期的错误 公众的记忆无疑会与这一事件的政治含义一起烟消云散。对国民党来说 不幸的是接收期间导致广泛批评、抗议的问题大多未得到圆满解决。因此 作为城市舆论疏远国民党的第一个转折点 这些批评抗议在内战时期的政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 接收阶段还标志着政府在回应日本侵略挑战方面已彻底失败。

公众批评和争论围绕着四大问题而展开。第一是解除日军武装迟缓 以及政府明显不愿惩处汉奸。第二个也是最臭名远扬的问题，是奉派前来接收日伪资产及机关的重庆政府官员的贪污行为。第三个普遍问题是此时采取了不恰当的经济和金融措施。最后 更微妙但并非次要的是 重返故地的官员对平民百姓采取了恩赐态度 他们认为 这些百姓未随国民党内迁 而留下来在日本统治下苟且偷生。

胜者与败者

不管道义之争内容如何 客观上存在着广泛的社会要求 即

国民政府应在战胜日本后立即解除勾结日伪政权者的军政要职，并予以应有的惩处。政府在这方面行动迟缓，主要原因是它需要日本人及其中国“傀儡”——人们对汉奸的称呼——维持日本投降后的“法制和秩序”。政府的心腹之患与其说是百姓的混乱，毋宁说是中共造成的明显威胁。由于缺乏足够的运输设备，大量国民党部队、保安机构及行政人员无法立即重返广大的日占区。可是，政府发现自己早已投入了一场与共产党的竞赛，目标是接收长江以北的日占区。以西南为后方的政府显然处于劣势，因为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农村。

不过，人们还纷纷指责政府对日本可能的投降毫无准备，未预先制订受降计划。还有谣传说，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活动和蒋介石对非嫡系将领的不信任，使他未能在日本投降后的关键几周内部署他的部队，未能最有效地发挥它们的优势。无论怎样，此时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摧毁一切潜在对手在地方上的势力堡垒，来重树和加强自己的权威。除了共产党人，他的对手还包括云南省的龙云和东北的张氏家族。所以蒋氏愿意联合任何愿意帮他完成这一大计的人，只要他们的势力不对他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即可。例如在东北，政府不得不联合前傀儡，因为这实为唯一可以指望的一批人，他们既不支持共产党人，也不拥护旧军阀张作霖的几位公子。^[6]

国民党与日本人的公开“联合”开始于 8 月 23 日，标志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向日本驻华军队司令官冈村宁次将军下达的那道训令。训令要求日军部队就地担当有效的防卫，保持交通线的畅通，等候国民党军队抵达。日本人还要负责收复近期被“非正规武装”即共产党人占据的地盘。随后，日伪部队即按此训令进行了攻势作战。

虽然 1945 年 8 月 11 日，蒋介石命令共产党军队原地待命，

但共产党人坚持自己有权接受敌军部队投降。根据 8 月 10 日和 11 日延安下达的命令，共产党军队向日军控制的重要据点和主要交通线发起了全线反攻，以迫其投降。何将军在 8 月 23 日向冈村下达训令时，共产党人正全力从日本人手中接管张家口市。从 8 月下旬到 9 月底，共军与日伪军之间有报道的冲突即超过 100 起。日伪武装成功地从共产党手中夺回了约 20 个城镇，它们分布在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西、山东及绥远。^[7]按何应钦将军的说法，11 月底晋察冀三省仍有约 10 万有武装的日军部队。^[8]

假如政府更敏锐地认识到尽早在光复地区重树其权威在政治上至关重要，以这种方式利用敌军部队引起的争议就会少些。但相反，政府却不必要地授权给声名狼藉的卖国政府，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地位。其结果是延长了日伪行使职权的时间，而这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明确批准。对此，《大公报》归咎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并且不乏审慎地称之为“先签投降书，后接收政府”原则。^[9]

共产党报纸对此专门提出质问，为何在光复地区以日伪官员而非国民政府的权限发布公告和政令，国民党为何对汉奸高官委以同等官职。《新华日报》质问道：为何像伪上海市长周佛海和南京伪军总司令这样的人获准自行发布本该出自重庆的公告？^[10]

首批到达汪精卫政府首都南京的新闻记者惊奇地发现，除了街头的零星中国士兵和偶尔飞抵的美国运输机外，“南京没有丝毫光复的迹象……冈村依旧在外交部大楼里高高在上。日本宪兵仍盘踞着司法院过去的房屋。日军哨兵四处遍布，奉命维持治安和保护他们的同胞……”^[11]一周后，另一位记者作了情形相同的报道。他写道，直到 9 月 4 日，南京各报仍受到日本特工

的审查。城里随处可见伪政府的告示和标语 其中‘和平救国’一语最醒目。〔12〕类似情况其他城市也有报道。

此外，重庆各报很快就开始报道，前伪政府官员摇身一变，又回到了国民党的队伍中。据说这一过程轻而易举 只需在办公室外面挂上块新招牌即可。人们要求给予敌伪人员以某种形式的惩罚或道义制裁 并禁止其担任公职 对此政府在正式言论中给予支持 但在实际行动上却经常忽略。有报道说，一些大汉奸正在获准逃往日本，而很多次要的敌伪官员则忙于联络南京的国军先遣司令部人员，后者是国民政府首批还都正式代表。9月9日的《大公报》写道：“在中国 无论发生何事 总有同一批职业官僚。他们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报人中机灵者已相继改换门庭 故汉奸报纸眼下正同其重庆弟兄一唱一和 虽则它们的编者于日本投降前还在大力倡导‘大东亚’和‘和平救国’方针。”

招致最犀利批评的实例中，有战争结束时的上海市长周佛海一案。周曾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汪精卫政府财政部长，是1944年汪氏死后伪政权中最有权力的人物。日本一投降，周立即宣布组成一个行动总队 并许诺以此确保上海的社会秩序 以显示他对党国的忠诚。一位记者就此事评论道：“目睹这帮往日常常欺压他们的人依旧官运亨通 大权在握 老百姓只能发出怒吼。”〔13〕

到9月底 这个问题已达到严重程度。舆论一致要求惩处汉奸。舆论声言 民族统一危在旦夕。批评者质问道 若此等人不受一定追究，再遇民族危亡之际，人们何以保持忠贞？〔14〕在舆论一片喧嚣之中 作为明显的反应 行政院草拟了一套惩处汉奸条例 经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修改后 由国民参政会批准。一些人急忙出来称赞这些条例和 9月下旬进行的一些缉捕，称其

已将政府延迟惩处汉奸卖国贼所造成的疑云‘一扫无余’。〔15〕

其他人则对这些条例审视入微，大挑毛病。最有争议的问题出现在第四条里。该条款规定，凡曾为抗战服务或任职期间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伪职人员，均可请求宽大处理。不出一周，那些最初欢迎条例的人也承认，一些最臭名昭著的汉奸已突然变成了爱国者，而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日本人的爪牙。这些汉奸声称，他们那样做是为了以“地下活动”方式帮助抗日，而这种自诩倒可以经常被证实是巧妙的谋财打算。随着曲线救国之说的蔓延，社会上的冷言冷语有增无已。

条例中还有一个引起争议的漏洞，它允许特殊对待 1945 年 8 月 10 日前投降的人员。批评者称，谁会等到那一天才明白日本将战败。最后，人们批评条例太重职位，忽视了对低级伪官员进行道义制裁，而这些人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对人民犯下了各种罪行。尽管此时逮捕了包括周佛海在内的数名汪伪政权重要成员，但并未做出全面的努力，把所有这些要求和指控交付一个公正的法庭或官方机构。〔16〕

11 月下旬有一篇报道指出，虽然若干最臭名昭著的汉奸在沪、京、穗被捕，但在北方竟无一人被拘押。〔17〕尽管那边抓了几个人，但更多以正式身份为日本效劳的人却被国民政府委以同等要职。被控于福建省主席 1934—1941 年任内勾结日本人的陈仪竟被委任为台湾省主席。〔18〕日本投降整整两年后，沈阳一家非共产党报纸仍表示不解，政府何以至今未采取步骤惩处前伪满洲政府官员，反而让他们填补东北国民党控制区的政治和行政职位。〔19〕

或许最可憎的要数政府任用汉奸高级军官一事，这些人干过直接帮日本人打自己同胞的勾当。〔20〕其中有伪蒙疆自治政府军政部长李守信。一家非共产党报纸认为，李是首批叛卖祖

国在日本人手下带兵的将领之一 时间早于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正式开始的 1937 年卢沟桥事变。^[21]战后 国民政府委任他为第十路军司令官。另一名汉奸将领门致中 则被任命为国军第九路军司令官 还有一位是李先良 身为日本投降前青岛地区皇协军军官，其后不久即受命出任该市市长。

赵保元 是 1937 年以前满洲国军队的一名指挥官。卢沟桥事变后 日本人将他调往山东 据说他在那里参与了日军对共产党游击队及其农民支持者的扫荡行动。 1944 年 日本人委任他为胶东半岛反共军司令。日本投降后 他逃至青岛 不久即被重新任命为国军师长，然后重返战场。1946 年 6 月 他在青岛附近与共产党进行的一次交锋中或其后毙命。另一个据说曾参加过扫荡的人是王继美，1946 年 1 月重受国民党委任，6 月被共产党捕获，作为战犯受到审判并被处决。

姜鹏飞在大连和沈阳与日本人共过事，在冀东组建过伪军，还奉派去日本深造军事理论。战后 他受命指挥国民党新 27 军，地点也是冀东。1946 年 3 月，他和他的部队被空运到东北长春，接替撤走的苏军。他受命改编满洲国部队并在东北共产党占领区组织暴动。1946 年 9 月 10 日 他和李明信、崔大刚一起在哈尔滨被处决 罪名是密谋在该地举行武装暴乱 从中共手中夺回该城。据说李明信曾在战争期间当过日本特务 后成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敌后战区工作委员会军事专员。崔大刚据说在其职业生涯中多次在日本人和国民政府双方之间摇摆不定，在哈尔滨策划不走运的阴谋时 是国民党第六路军的一名军官。在共产党占领的张家口市 刘建勋因策划类似的阴谋终被处决。据说刘曾在天津为日本人率领一支特务分队 日本投降后不久 即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收编。^[22]

何应钦将军在 1945 年 11 月底称，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